

长江文化论丛

黄河作为中国文明摇篮

的条件和机制，黄河流域吸纳了各地的文明要

素，也融汇了各地的文化，因而是一种经过升华的文化。古文化

遗存在长江流域虽然分布甚广，对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应作比较研究。

贺云翱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去。客观上就是能为今天服务。给人启示。搞历史科学的，自然比较关注长江文化研究在历史科学领域的的作用，但学术都离不开现实。

长江文化论丛

贺云翱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文化论丛/贺云翱主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

(中国学人丛书.第3辑/孙汉洲主编)

ISBN 7-5034-1794-3

I. 长… II. 贺… III. 长江—文化—研究—中国
IV. 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3325 号

长江文化论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江苏如东县文华彩印厂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32

印 张:9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1500 册

版 次:2006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34-1794-3/G·0376

定 价:20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学者访谈

- “长江文化”纵横谈——梁白泉先生访谈录 邵 磊 贺云翱(1)

文化史论

- 长江文化及其研究刍论 刘玉堂(9)
试论长江文化的发展特征 徐吉军(16)
论长江文化的发展线索、文化特征及其研究方法 邓剑秋 张艳国(25)
清代长江文化的区域特色和文化效应 林永匡 王 熹(34)
近代长江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成就 陈振江 吴星云(38)
“长江文化”与“考古学”刍议 贺云翱(43)

考古论坛

- 长江流域考古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 何 弩(64)
良渚文化玉器丛谈 汪遵国(70)
长江流域的原始艺术 邵学海(89)

文化探析

- 一个被中国历史遗忘了的伟大民族 林 河(102)
金沙江求礼记 史 式(133)
三星堆青铜人体造像初探 万 娇(147)
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和氏族部落论纲 杨东晨(173)

建筑文化

- 诸葛民居的庭院园林及其特色 徐国平 陈 星(185)

鹅湖斜塔考	王立斌(190)
从鄂东、皖西等地古民居的格局看先民们的文化理念	张寿来(197)
试论楠溪江村落民居形成及特点	尹津敏(204)

六朝文化

南京六朝文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谭 跃(209)
武汉黄陂滢口古墓与孙吴宗室墓葬	徐劲松 李桃元(223)

文化名人

林散之书法的鉴定	陆 衡(235)
李白《峨眉山月歌》作于何地	唐长寿(247)

民族民俗

从出土灶具说灶	许智范(255)
白裤瑶服饰收藏品赏	盘福东(260)
原始陶器装饰与信仰民俗	徐向阳(266)

遗产研究

江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刍议	刘谨胜(272)
--------------------	----------

学者访谈

“长江文化”纵横谈

——梁白泉先生访谈录

邵磊 贺云翱

梁白泉,男,72岁,汉族,重庆市合川市人,研究馆员。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历史系,到南京博物院工作至今,历任副院长、院长。1992年获国务院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离休。曾把《江苏史陈列》革新改陈为《长江下游5000年文明史》展览。发表各种体裁的文章100多篇约数十万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卷中的《中国博物馆》以及《国宝大观》、《南京博物院藏宝录》、《宜兴紫砂》、《花鸟画选集》、《中国肖像画选集》、《傅抱石画集》、《吴越文化》、《南京的六朝石刻》等图籍。为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江苏省民俗学会会长、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学术观点有:社会科学的研究须围绕人类学、民族学来进行;人类文化是人类的生态文化,是继承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于高度发展起来的专制政治和农业文明;科学与艺术殊途同归;民族前途的根本希望在于合理利用资源和培养人材;教育需要以“美育”为关键。近年来,主要参加长江文化、运河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研究。

○梁先生,能否请先谈谈“长江文化”的内涵如何给予界定?其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定义据说有 200 多个,我的想法是在历史上讲应作为大文化来理解,经济、政治也应包括在内,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成为文化积淀和文化研究的素材,因而有很多文献或实物供我们明其特征、探其规律。谈“长江文化”,现实中的经济、政治按说也可以纳入其范畴,但其实际很难把握,我们把历史上的“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出来,客观上可以达到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给未来以启示的目的。如果把“长江文化”的内涵局限在狭义的文化艺术上,那学术意义就大大降低了。可以说,历史领域中的“长江文化”的课题是无所不见的,重要的是依靠多学科专家精诚合作,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做,一步一步地走,必然会取得成绩,会对中华文明的整体研究,对文化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长江文化”作为一项学术课题,其正式提出不过是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事,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它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我们想请您谈谈这个课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从搞历史科学的角度出发,过去一直流行一种观点,即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凝聚着优秀史前文明的母亲河,但从唐中后期直至南宋定都临安,我认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已转移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唐宋以后的长江流域由此形成了对照。即使是史前和上古文化,长江流域也有非凡的成就,这方面学者们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请先生举些具体的例子。

●1949 年以来,国内的考古成果很多,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彭头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反映出长江中下游在远古时期也曾经辉煌过,在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意义和价值至今还未得到充分估计;向前再上推到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发现,长江流域的远古文化已达到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步,中国文明的单一性同时也受到更多人的质疑。与此同时,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对“长江文化”也给予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云南元谋县发现的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时代最早的直立人遗迹。整个长江流域的古人类足迹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从中游到上游,均未曾间断。如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郧县人、郧西人,向早期智人发展过程中的和县人、南京汤山人,早期智人阶段的长阳人、桐梓人、丽江人、资阳人等。最近,距今 200 万年的“巫山人”的发现又是一项令人鼓舞的成果。有的古人类化石地点同时伴出有手工制品,显然已不仅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了。一部分古人类学家根据长江流域的古人类地点比较密集的客观情形,进一步认为这里是人类远古先民的摇篮。这正是人们要重新认识、定位“长江文化”的重要前提。但仅此还不够,还要重新认识“长江文化”究竟处于何等位置,其价值乃至现实意义到底有多大,这些都是提出“长江文化”的重要依据。

联系到历史上,神话时代我们不去谈,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讲到“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936 年学者卫聚贤、蔡元培等 60 多人在上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了《吴越文化论丛》,卫聚贤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古文化是从长江流域中下游开始发达的,这或许太过超前,但对开拓人们的学术视野也有一定意义。

1990 年 1 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10 卷本的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亦提及“绍兴之黄帝、舜、禹古迹”共计 37 处,其中黄帝 2 处、舜帝 16 处、大禹 22 处。还有学者认为蚩尤也是长江下游的古代部族。历史地理学者陈桥驿研究《水经注》,发现西南各地有 30 多处地名是以越语命名的。由此表明,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已经关注到“长江文化”这一问题,这就要看我们今天如何审视它。

我们再对世界四大古代文明进行比较,发现都位于赤道以北的北纬 20—36 度之间,巴比伦在北纬 28—36 度,其域内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长 2750 公里;埃及在北纬 20—32 度之间,域内尼罗河长 6667 公里;印度恒河文明在北纬 20—30 度,域内恒河全长 2700 公里;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北纬 34—36 度,长 5460 公里。长江

全长 6390 公里,位列世界第三大河流,纬度与巴比伦相当。

○研究长江文化的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它必须与研究黄河文化相结合,顾此失彼,都不可能真正阐明中华文化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所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请问先生,您认为是否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认为,古文化遗存在长江流域虽然分布甚广,但也应该和黄河流域联系起来看待。我们现在发掘、研究“长江文化”,并非是想用长江文化取代黄河文化,或是作孰优孰劣的比较,但历史上确实对长江古代文化关注不够。我们要研究的是黄河作为中国文明摇篮的条件和机制,黄河流域吸纳了各地的文明要素,也融汇了各地的文化,因而是一种经过升华的文化,我们应对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作比较性研究。有人认为黄河文化的衰落与气候变迁有关,是不是这样?钱穆认为气候因素并非重要,仍是“人事”在起作用,究竟是什么原因还值得研究。

长江流域的天然条件十分优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人类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的趋于多样化。他同时提出劳动生产率是与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可以归纳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和人周围的自然。外界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的自然,例如土壤的肥力等;一类是劳动资料的自然,例如可以航行的河流以及森林、金属、煤炭等。这两类条件在人类文化的初期阶段,前者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较高的人类文化阶段(如封建社会),则是后者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类的劳动力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我们研究长江文化,可以探讨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济与文化盛衰演替的机制、原因,以便更好地认识历史,把握现实。这也是“长江文化”研究课题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都是搞历史科学的,自然比较关注“长江文化”研究在历史科学领域的作用。但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它的现实性,您能具

体说说长江文化研究的现实价值吗？

●今天是昨天的发展和延续，我们总结了长江文化的过去，客观上就能为今天服务，给人以启示，如小城镇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等。中国汉代有大城市 20 多个，宋代全国有名的镇有 4 个，即朱仙镇、汉阳镇、景德镇、佛山镇。大城市的发展到宋代就停滞了，明代已开始依靠集镇建设的发展，这类集镇又以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最为集中，每个镇大约以 6—7 公里为半径，遍布太湖水网地区。这些集镇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明朝中后期起，江南经济发展更加显示出这一地区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特点，其农业生产结构的配置，大约一半土地用来耕种粮食，一半土地用来种经济作物（棉、桑、果木、花卉等），手工业随之发达，商业也更加兴旺起来，形成集市和水市。经济重心的形成，必然促进教育的普及，并使文化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最终使这些地区发展成为人材辈出的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提出中国可以不走西方道路，不是让农民破产进城，而是就地发展乡镇工业，这是搞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好途径。也给发展中的国家提出一条新的途径。可见，研究“长江文化”的历史形态，小城镇研究就很有意义。从大的方面说，对长江文化历史的研究总结和归纳，对于认识中国文化复杂内涵的来源和构成，认识不同空间和体系的文化的整合，考察当代不同区域文化经济的互动关系都有重要价值。

○梁先生，“长江文化”课题提出以后，已有不少论著问世，先生能否给我们系统的介绍一下相关成果。

●对这个问题，我只能举些例子：早几年长江流域曾经有过市长联席会议，研究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东部、西部如何共同协作。现在上海浦东的开发，三峡大坝的建造，乃至重庆成为直辖市，都是缩小东西部地域差异的战略性步骤。大西北要开发，东北要开发，但东北、西北开发的前提是长江流域的开发。

关于长江流域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武汉市委党校办的《长江论坛》是研究长江的综合性刊物，其中有个专栏叫做《长

江文化彩廊》，主要研究长江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1991年，长江流域的一批专家学者在武汉召开了“长江文化研究规划与协商会议”，在此之前，《东南文化》杂志已开设了“长江文化研究”专栏。1995年，“首届长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有学者提出长江上游对外通道“西南丝绸之路”问题，并出版了《西南丝绸之路》论文集。李学勤先生主编的《长江文化史》也是这一领域引人瞩目的著作。

90年代初期，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与日本龙谷大学共同发起的“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考察研究，先后调查了长江流域苏、沪、浙、赣、皖、湘、川、滇、桂、粤等10个省、100多个市县的早期佛教文化遗存，长途奔波，行程万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湖北社科院副院长张正明先生，有篇文章论及中国的政治中心何以始终没有南移。南京虽有“十代都会”之称，但作为全国性首都还不到100年，其中明初53年，民国38年。何以文化中心的南移却未能带动政治中心的南移？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北方边患，为了国防“守边”之需。在民族的迁徙上，由北迁南也愈加成为主流，现今云南境内的20多个少数民族大都是北方人。

在研究方法上，张正明先生认为要重视“采风”，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为什么呢？同意他所说，这是由于南方比北方有更多的文化富积区，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越武陵山，而止于五岭，这个地带历来是民族迁移区，是文化的“沉积带”，学者林河等人也对此进行过考察。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有《贵州傩戏》、《古傩寻踪》、《面具文化》、《中国傩文化》、《傩史》等著作问世。张光直先生认为人类社会早期都普遍存在着萨满文化和萨满信仰，并有阐明其观点的著作出版。1995年12月出版的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是研究长江文化的重要贡献。此外，史式教授与台湾黄大受教授已制订了编写大型《中华民族史》的计划，这将是海峡两岸学者携手合作探寻中华古史的大手笔，全书有关中华民族史源头

的追溯将从南方古族开始。目前,有关该书的编撰已在重庆、海口、昆明召开了3次学术研讨会。

我想,现在又有《长江文化论丛》专门学术阵地的创办。这是长江文化学术课题产生之后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学术界人士不断努力的产物,这个学术阵地的诞生,对长江文化研究一定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长江文化既然是个新课题,那么要想取得学术上的突破,就必须在方法上、理论上要有创新,请问梁先生,您认为长江文化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呢?

●如何在“长江文化”研究这一课题上取得突破,我以为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即“多学科,几代人”。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应由历史、考古、社会、谱牒、语言、心理、自然等学科的学者们组成。“长江文化”的内涵十分深湛,学者们往往殚精竭虑,穷年皓首,甚至毕其一生,所取得的成果也许都是非常有限的,这就需要付出数代人的努力。

首先须认定长江文化是多民族创造的。历史上情况如何,有待探索,今天分布在这一流域的,有汉、壮、回、彝、藏、苗、布依等大约30个民族,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与交融,呈现今天长江民族文化的面貌。民族文化是生态文化,因而需要探索产生这些文化的一般与特殊的、静态的与动态的种种环境和条件。

方法上,请民族学者参加,因为民族是不断移动的,多采取田野调查作业的方法,综合多学科的成果,再逐步取得阶段性综合成果,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我还赞成对所谓“神秘文化”开展研究。学者季羨林先生说:“如果说20世纪的显学是敦煌学的话,21世纪的显学是藏学。”这是很有见地的。

图像学在19世纪的西方被称之为“圣像学”,后扩大到利用其研究东方艺术。图像直观,内涵丰富,是文字替代不了的。我们古代有“左图右史”的好传统。这里的“图”的发展,可认为即今天的“图像

学”，“史”就是“文字的历史学”。现在岩画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长江流域的岩画不少，我们讲文化特色，文化比较，有时实物比之文字更能说明问题。研究长江文化一定要吸纳多学科的最新成就，只有站在时代的最高峰，才能更全面地总结过去，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心理学的研究也很重要，在这一点上，瑞士学者容格(C, G, Jung)的理论值得重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只有普遍的集体意识存在，包括集体的无意识，到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强烈的个人意识。

前两年，据报导，《黄河文化》已经出版，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的条件。

○在长江文化研究中，文物考古学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在古代文献中对南方的记载相对偏少，很多问题要靠考古资料来恢复历史真相，阐明长江流域先民的创造。另外，可能民俗学也很重要。

●讲得对。现在我们发现，很多东西文献上虽然没有，考古资料中却很丰富，民俗中还有，老百姓的口碑中还辗转相传，因此广泛的民俗学调查研究很重要。总之，在研究视角及研究手段上一定要有突破，要有新的思维。

○梁先生，您近年来在“长江文化”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能否请先生向我们做点介绍。

●我本人在南京博物院当负责人时，亲自动手参与设计了“长江下游五千年文明展”，设计了“文明与创造”以及若干专题。其次是在长江中下游古代文明如何向近现代文明“过渡”的研究上，我以为一定要从民族学的角度来做工作，要联系语言学来研究。此外，我还曾支持在《东南文化》杂志上开设“长江文化研究”专栏，同时召开了有关会议，展开了一些调查，参与讨论了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最近我注意到长江文化、运河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结合，这几方面都是相互有联系的。现在我虽然已离休，但学术研究不能停止。今后，我将与国内外学者一道，共同为推进长江文化研究的深入，尽己所能，只是个人的知识和力量都实在是太渺小了。

长江文化及其研究刍论

刘玉堂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近几年来,长江文化及其研究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1995年8月中旬在武汉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是在国际文化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么,长江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学”,何以能迅速崛起?我认为,长江文化研究,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它的迅速崛起,实为势所必然。

其一,在国际大文化格局中,流域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建设已成为世界性潮流。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河流文化,如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莱茵河、多瑙河、伏尔加河等大河的文化,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然而作为世界第三大河流的长江,其流域文化的科学认识和整体把握仍处于“千呼万唤”之中,这不能不令人困惑。

其二,长江流域的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同朝鲜、日本和地处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预测,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面对飞驰而来的“太平洋世纪”,长江儿女焉能无动于衷?

其三,中华文化历来是由北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二元耦合的态势虽因时而异,二元耦合的结构却始终存在。例如:经学分北学和南学,禅宗分北宗和南宗,

戏曲分北曲和南曲,书画分北派和南派,等等,甚至拳法也有北拳和南拳之别。然而长期以来,被当作中华文化唯一摇篮的黄河流域文化理所当然地受到世人的礼遇,本当与其并驾齐驱的长江文化却遭到不应有的冷落。这一“热”一“冷”的两极现象,严重地妨碍着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全面体认和客观评价。而扭转这一反常现象的唯一途径,就是将长江文化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使之与黄河文化研究处于平等的地位。

其四,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至:我国境内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发现于四川巫山和云南元谋,我国发现于湖南澧县和浙江余姚的人工栽培稻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我国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青铜雕像群出土于四川广汉,苏、浙、沪三省市发现的精美的良渚文化玉器,鄂、赣、皖三省市发现近百处商周时代的矿冶遗址,以及鄂、湘、豫、皖四省楚墓出土的大批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等,无不给学术界以巨大震动,迫使人们对长江文化的成就、特色和地位作出新的思考。

其五,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愈益发挥出突出作用,显示出先导性。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和东南沿海全面开放的趋势,确立了建设横贯东西、带动南北的产业密集带的“T”型战略决策。尤其是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兴建,芜湖、九江、武汉港的对外开放,长江防护林宏伟工程的启动,以及三峡工程的上马,长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

显而易见,长江文化研究,对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文化的演进,对于从整体上认识长江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握长江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文化,以及研究它与东南亚、南亚乃至环太平洋地区的古今文化交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二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文化由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这二元耦

合而成,而且长江文化的整体水平并不比黄河文化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何人们对黄河文化的青睐和对长江文化的冷淡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我以为,这种强烈反差的形成,源于以下三“差”,即政治中心的“位差”、考古发现的“时差”和文化学者的“视差”。

先说政治中的“位差”。中国历来的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由此形成了一种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而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又是受政治文化制约的,政治上的“中原正宗”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黄河一元”。《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载袁准劝曹爽的一段话,便表露了中国古代士人的普遍心态:“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抗衡”。这里的“技”即指文化。久而久之,人们很容易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既然中华文明的摇篮只有一个——黄河,那么,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就都不应该偏离黄河这根轴线。

再说考古发现的“时差”。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重要遗址和遗迹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现的,如屈家岭文化发现于1954年,河姆渡文化发现于1973年,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浜文化发现于50年代后期,而对其文化特征与类型的确认已进入70年代了。同样,虽然良渚文化最早发现是1934年,但其名称则直到50年代末期才定下来。与之相反,黄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在本世纪20年代就发现了,如仰韶文化发现于1921年,马家窑文化发现于1923年,齐家文化发现于1924年,龙山文化发现于1928年。只有大汶口文化例外,发现于1959年,即便如此,它仍早于长江流域大多数文化的确认和定名时间。至于1951年发现的青莲岗文化,则很难把它划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范畴。这就是说,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使得一些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较早地认识了黄河文化,而当今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有不少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观点的沿袭和发挥。尽管本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原始社会遗址的考古发现大大超过

了黄河流域,但“先入为主”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已很难迅速扭转了。

正是由于政治中心的“位差”和考古发现的“时差”,才导致了文化史研究者的“视差”。在某些文化史学者看来,所谓中华文化,庶几成为黄河文化或曰中原文化的同义语。于是,近年来开展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大多偏重于一条河流——黄河、一个学派——儒学、一种宗教——佛教、一批都市——北方古都,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而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长江流域文化,则几乎未能进入某些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

三

长江文化的特殊地位和研究现状,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长江文化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便涉及到长江文化概念的界说。

长江文化的基本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长江文化,是以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位置优势,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换言之,即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其概念内涵既具有专门性、特异性,又有包容性、序列性。狭义的长江文化,即指文化地理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长江流域文化。它远溯仙人洞文化、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西南、华南地区一些尚待确定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蕴藉滇文化、夜郎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容纳巫觋文化、傩文化、道教文化、海派文化、岭南文化及闽台文化;发展为现代革命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

长江文化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势必形成一些带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创新、进取和开放。

长江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水稻的栽培和推广,是长江文化为人类作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